

X
31

何塞·卢岑贝格 著
黄凤祝 译

自然不可改良



前　　言

西格弗里德·帕特

巴西联邦共和国亚马逊州的州长阿马索尼诺·门德尔斯(AMAZONIO MENDES),最近建议何塞·卢岑贝格出任他的环保秘书。因为卢岑贝格不愿意移居玛瑙斯地区(MANAUS),且不愿意放弃正在实施中的一系列行动计划,最后他们达成共识,卢岑贝格以自由合作者的身份负责向该州提供咨讯建议。

位于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亚马逊州,面积约为委内瑞拉的两倍,是世界上自然生态环境保存得最为完好的地区之一。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目前已有百分之二十被开发,但在亚马逊州仍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雨林保持着原始状态。在巴西的其他几个州,帕拉—马拉尼昂(PARA MARANHAO),阿马帕(AMAPA),罗赖马(RORAIMA)和朗多尼亚(RONDONIA)以及北部的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S)和托坎廷斯(TOCANTINS),雨林正逐步遭到破坏。亚马逊州现在所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据该州州长称,目前已有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木材公司与政府进行过接洽,并提交了开发林木资源的申请,但他本人已经决定回绝这些申请。而在邻国苏里南,那里的雨林正在遭受印度尼西亚公司的掠夺性开发。

阿马索尼诺·门德尔斯曾经多次重申，热带雨林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最为宝贵的财富。他的政绩无疑将使他走入历史。他计划在其任期的最后三年内，确定热带雨林保护的发展方向，并使之成为全球雨林保护的典范。亚马逊州现有人口约三百万人，其中一半人口居住在玛瑙斯地区，且大部分生活在贫民区。因此这一政策也将牵涉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更确切地说，是林地人口城市化趋势的逆向回流。

亚马逊州的州长希望能够把该州经济引入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而在这一点上，何塞·卢岑贝格无疑可以为他提供有力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是寻找切实可行的、合理利用热带雨林的方法。它必须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可持续性利用林木资源的一种模式。同时这种开发应该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并接受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

与此种开发相对应的是可以再生的农业经济，和分散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源经济。在渔业领域——亚马逊河流域拥有世界上除海洋之外最为丰富的鱼类资源——则必须立即制止目前盛行的滥捕行为，而这种对鱼类资源的掠夺性捕捞，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国公司操作的。同时本地居民应该享有从这片土地上获得必需生活给养的优先权。

门德尔斯州长和卢岑贝格同时意识到，玛瑙斯自由贸易区（将在2013年取缔）和当地的工业化趋势正在使这一地区的发展走入误区。为了适应未来，必须因地制宜、尽可能多地发展小型工业和使用软性技术的手工业。

门德尔斯把现时的决策称为“一个历史的时刻”。卢岑贝格发出呼吁：必须立即实行强制转轨。门德尔斯已经准备为此采取强有力措施，他同时表示在本届任期后，将不再参加竞选。

他希望自己的做法也能够对其他联邦州州长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永不知倦的巴西生态学者再次试图抓取主动权,以制止在亚马逊河流域进行的掠夺性开发。卢岑贝格在担任巴西环境部长时,对该国走出自杀式生态发展误区所作的努力,许多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卢岑贝格再次试图让自己相信政治家的良好意愿,这次是门德尔斯州长,过去则是费尔南多·科洛尔·德·莫罗总统(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但是卢岑贝格已经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变得成熟起来。这一次他没有跻身政界,去借助行政手段,而是扮演了自由顾问的角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0年费尔南多·科洛尔·德·莫罗总统任命卢岑贝格担任他的环境部长。向一个爱慕虚荣且不失保守的总统承诺接管这个部,对于卢岑贝格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作为一个激进的生态学者,他很清楚,开发亚马逊河流域可以带来多么大的经济利益。

卢岑贝格意识到了总统的这一野心,但他决定孤注一掷,冒险与魔鬼签约。在他执掌该部后,所有破坏环境的大项目纷纷下马。在他担任环境部长期间,他曾经宣布停建了经由秘鲁连接太平洋和亚马逊河流域的公路,同时禁止在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矿床卡拉加(CARAJAS)兴建更多的冶炼高炉,而这些高炉通常都是使用从雨林开采烧制的木炭作为冶金燃料的。

科洛尔总统面对国内巨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设法从国外寻求经济支持,以重新启动暂时搁置起来的大的项目。他所代表的党派最终也要求看到经济实绩。“人民要求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发展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巴西记者弗朗西斯科·科埃罗这样描述当时的境况。科洛尔的坐椅摇摇欲坠,为了挽救

他的政治生命，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环保梦想。

在新的贷款支持下，长期搁置的一些大的项目被重新启动。另外，在巴西东北部兴建的欣谷河(XINGUO)大坝对自然造成了严重破坏，被迫迁出的居民也对此怨声载道。同时位于南部的一项核设施扩建工程也列入了财政预算表。

鉴于政府的上述举措，何塞·卢岑贝格在纽约出席一个河流环保会议的预备会议时，对巴西政府的现行政策进行了批评，他同时对那些计划为这些项目提供贷款的工业国家发出了警告。他甚至更进一步，指责巴西政府的一些官员贪污受贿，支持环保项目的资金流入了一些个人的腰包。巴西环保局也没有逃脱他的责难，卢岑贝格称这一部门为“百分之百的木材贸易殖民地”。

巴西环保局局长爱德华多·马丁(EDUARDO MARTINS)因此在卢岑贝格不在国内时，擅自解雇了他的私人秘书。巴西总统科洛尔则利用马丁和卢岑贝格争吵的时机，把他们双双赶下了台。

卢岑贝格的政治生命突然终结。科洛尔知道，这位国际知名的生态学家不可能参与他的反自然的新政策。他不得不先发制人，解除卢岑贝格的职务，以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全球性的环保浪潮使卢岑贝格重新成为“巴西环保运动之父”。早在 1988 年，他就曾因为在环保领域所作的卓越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特别奖。

当时大多数人都对卢岑贝格批评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他出卖了保守的科洛尔政府。而工业国家的生态组织则看到，卢岑贝格在巴西政府中所推行的方案，由于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力而被迫中断。其中一个例子即是有关巴西国内核设施的扩建计划。1990 年 7 月，当时的德国发展部部长尤尔根·瓦恩克

(JUERGEN WARNKE)曾透过传媒承诺,将为巴西热带雨林的保护提供250亿马克的经济援助。但是传媒回避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项援助是有价码的。为了感谢德国政府对于亚马逊河流域保护所作的努力,双方首先应就巴西核设施扩建计划达成共识。(西门子子公司的一项交易——“发电站联盟”)

当这笔交易的内幕在巴西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时,联邦德国的新闻媒体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报道此事,并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谣言。但是在发展部长尤尔根·瓦恩克的热带雨林之行之后仅几周,技术部长海茵茨·里森·胡贝尔(HEINZ RIESEN HUBER)前往巴西,顺利签署了有关扩建核设施的协议。

如此看来,事实上,卢岑贝格是间接地被外国资本赶下了台。他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他只是尽己所能,试图拯救人类和自然,使之在技术官僚的破坏欲下得以苟且偷生。对于被撤销职务,卢岑贝格自己评论说:“我的真正上司,是这个美丽的星球和她的后代。”

卢岑贝格担任环境部长只有两年。1992年3月,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部长办公室,经济和政治最终抛弃了它们的“绿色良知”。随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地球峰会,卢岑贝格以非官方的身份列席了此次会议。同年科洛尔总统因为经济丑闻而被弹劾,卢岑贝格的地位也因此得到提升,因为在贪污舞弊的总统治下丢掉自己的部长职位,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相反,现在连生态学奠基人也会认为,当初卢岑贝格进入政坛反而是不可理解的。

今天的卢岑贝格全力以赴投身于他的生态农场——该娅——的建设,同时进行他的环球旅行,以近乎传教士般的执著和热情,为拯救我们的星球而奋斗。

卢岑贝格抱怨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但绝大多数人却始终对此视而不见。在他看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意味着人类生存机会的减少。他把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官僚比作宗教运动中的传教士，他们向人们展示每一项新技术，仿佛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基础之上而并非与之相悖。这些传教士所宣扬的“救世主运动”基于以下两个错误的理论：地球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同时存在一个可以消纳所有垃圾的无底洞。

卢岑贝格指出，如果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转变观念，同时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视为一个有生命的行星。他以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该娅”的名字来称呼生机勃勃的地球。“该娅生命循环的每一步骤都具有它的意义：没有生命的水、岩石、空气，都是该娅生命的组成部分，正如水之于我们的血液和细胞一样至关重要。这又好比蜗牛背上没有生命的石灰外壳，没有它，蜗牛就无法继续生存。”今天我们所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掠夺性消费型社会，对于卢岑贝格来说，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的未来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机遇，用崭新的视角和观念去变革现存制度中的贸易方式。何塞·卢岑贝格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许多很好的经验和建议。在巴西南部作为政府的自由顾问，他要求发展可再生的农业，循环利用废料，并采用温和的技术。他希望以此证明，发展同时有利于人类和自然的经济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于卢岑贝格而言，并不存在垃圾。纸张、骨头、玻璃、金属，都只是有用的东西被放错了地方。

卢岑贝格坚决反对在农业中使用有毒物质，“从事化学研究的先生们是从充满敌意的角度出发的，对于他们而言，所有害虫都是肆意专横并且患了狂犬症的，应该斩尽杀绝。”卢岑贝格指

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说的害虫实际上是一种生物指示剂，它可以告诉我们，人们在农作物栽培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不愿意让自己陷入到诸如究竟多少剂量毒药才是必要的争论中去，事实上他所持的观点是，人们根本不需要使用毒药。而且他可以援引许多实际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本书将公开这位伟大的生态学家的谈话录和有关论文，并以原声带的形式阐述这位永不知倦的斗士的思想及其所从事的事业。

卢岑贝格在本书中，将讲述他从巴斯夫(BASF)公司的一名职员成长为一名环保斗士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他将阐述有关无毒农业的理论；在《盈利取代支出》一章中，他指出社会正义和生态学休戚相关；本书的结尾部分译自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所作的一次英文讲演，他强调，我们必须把知识和智慧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获取人类继续生存的机会。

除本书外，我本人还曾经就卢岑贝格的工作写过一本《巴西人的绿色良知》，并拍摄过一部电影《激进的生态学家坐上部长交椅？》。所有这些努力，包括出版此书，都是为了启示和帮助人们共同实现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拯救”我们的星球。

译 者 序

1. 人与自然环境

早在马尼拉念高中的年代，我就曾很强烈地感觉到：人们对其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很满意。他们满腹牢骚，却又无可奈何地生活着。很多人认为，要获得一个美好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改造这个社会，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愿在现实社会中生活，而是反抗、抵制和逃避现实。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纷纷离开菲岛，到美国留学。他们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是的！换个环境，就不必费心去改变这个环境。可是我们生活在这颗星球上，又能逃避得多远呢？我将自己的这一感触写进了自己的中学作文：“要适应这个环境，才能改变这个环境。”当时，我期待着老师能够对我的观点有所指教。但令人遗憾的是，老师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直到今天，对于这句话的正确与否，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后来在德国，我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曾经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是

否应先适应环境，才能改造环境，这一问题我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佛教教义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要求人承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应该主观地或主动地去改造我们承受不了的事物。

《圣经》给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在西方自然环境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圣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自然，创造了人——男人，他又创造了伊甸园让他居住，并创造了女人，作为他的伴侣。从男人和女人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天起，人才真正地开始在自然中生活。在这里，自然是作为人的对立面、作为上帝惩罚人的工具而出现的。由于上帝的惩罚，人被迫离开了伊甸园，人必须克服伊甸园外艰苦的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下去^①。《圣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界定，明确地表示人类只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当基督教成为统治欧洲的主导思潮时，这一观点也就从此在西方文化中生根发芽：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人为了生存，必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虽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但是直到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才真正具有能力去“征服和改造自然”。工业革命使西方得以改进其生产，经济逐步走向繁荣，而国力强盛，科学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使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西方文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征服了“全世界”。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世界人口迅猛增长。1830年，世界人口总数为10亿。193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0亿，在一百年

^① 参看《圣经·创世记》。

中,增加了一倍。而1975年的统计数字,则飞升至40亿,在短短45年内又翻了一番。专家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会达到60亿。^①另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预测,世界人口在2025年将会达到80亿^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在近一百多年来,从原始的手工业生产步入机器化大生产,进而又走向了现代的自动化生产,社会财富成数十倍地增加。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污水、废料、尘渣、噪音、电波、废热、辐射和重金属等,这些污染物被倾倒在自然环境中,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环境污染是人类经济活动不当造成的。为了保障目前的生活享受,人们过量地生产和消费,导致滥取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破坏和毒害了自然环境。据统计,地球上的火电站每年都要排放出成亿吨的漂尘、6000多万吨的硫化物,而汽车每年要排放2亿多吨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每年要制造7亿吨的生活垃圾,农田和果园每年需要喷洒数百万吨的有毒化学物质。这一切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大大超出了自然的“自净能力”,并因此导致森林枯萎,成千上万的湖泊变成“死海”。氟利昂对大气臭氧层造成的破坏,导致过量的紫外线辐射穿越大气层,对人体健康和植物的正常发育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增,加强全球暖化的“温室效应”,使冰川融解,海平面上升,将使大片沿海低地沦为泽国^③。

^① 参看宋健《向环境污染宣战》,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第20页。

^② 《星岛日报》1998年8月29/30日欧洲版,第A12页。

^③ 参看《20世纪灾祸志》,第274—275页,李原、黄资慧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

地球“温室效应”还导致一些地方降雨量过多，引发水灾；例如今年夏天中国西藏因罕见的高温，导致冰川融化度加深，同时各地普降中到大雨和暴雨；长江流域因为 20 年来乱砍乱伐和沿湖置田、江堤失修以及人为的偷工减料，致使一些河段的江堤在洪水冲击下发生崩决^①，造成全球瞩目的特大洪灾；另据德国电视二台 9 月 7 日的消息，孟加拉三分之二的国土已被洪水淹没，受害灾民达 8000 万人，据报道，这是孟加拉百年来发生的最大一次洪水，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速度加快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山地林木被盲目砍伐则是另一原因。西藏、长江、嫩江、南韩、孟加拉、墨西哥以及西欧的比利时因雨量过多，同时在今年夏天发生水灾。去年又由于干旱少雨，导致北韩的旱灾和印尼的森林大火等。寻根溯源，这些灾害无一不是人对自然肆意掠夺，致使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2. 自然不可改良——绿色哲学的兴起

针对西方消费型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与掠夺，何塞·卢岑贝格提出，自然是不可以改良的，并将之作为理论基础，尝试建立其绿色哲学体系。

绿色哲学是什么？绿色哲学是一种环境科学，用逻辑思维来研究一切有关人类环境及其存在的有关事物的科学，这种事物可以是一种具体的存在，也可以是抽象的思维或信仰。

一种信仰作为人生观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它就与环境一起

① 参看《星岛日报》，欧洲版，1998 年 8 月 24 日，B 第 2 版。

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这个人将来的命运。如果，绿色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信仰，一种人生观，以提供给人们作为其将来的行动参考，这种研究的重心将是人类价值观的研究——人类道德的研究。人们称之为绿色道德哲学。

绿色道德哲学和其他哲学一样也是具有时代性的，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种思维，并受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制约。所以它研究的不是一种真理，而是人性的、时代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这种准则没有绝对的对错，它的是非是相对的，以主体个别立场的判断为依归。

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都是以道德哲学为主体而发展起来的。当道德哲学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时，依赖其建立的经济、政治、法学和社会哲学都将会发生动摇，这个社会就会产生信仰危机。

何塞·卢岑贝格认为：人类价值观的改变，是由于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和经济生产发展所促成的。由于工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人类消费欲望的增长，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促使人们对接纳已久的存在价值观产生怀疑，失去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而陷入消极与苦恼之中。这时人们的心灵是空虚的，是绝望的。何塞·卢岑贝格也同样受到了这一冲击，开始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

在生活的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自然是不可以改良的。

人类生产技术的提高，消费欲望的增长，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促使现存自然环境的平衡机制发生了变化，并反过来直接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的利益。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环境哲学提出了改变社会消费结构，进而促使社会生产结构的改革，即要求人类的工业生产应该注重保

护自然环境原有的均衡，一切危及这种均衡的工业生产机制都应该被制止或予以改革。人们要求将来的社会工业生产，是一种绿色的生产过程；并要求人的生活与消费应该注重实质的，而不应是数量的享受。这种价值观是绿色哲学的基础。

绿色哲学要求回复到“人与自然和谐一统”的概念上，这种观点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

中国的自然观念，以老子的自然观为代表，要求“人法自然”。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萧(寂)呵(寥)呵，独立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之名曰大。大曰(折——运行不息)，(折)曰远(无边无际)，远曰反(归返根源——自然)。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宇宙)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王)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

何塞·卢岑贝格除了反对改造自然，同时要求人们具有长远的眼光，能够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着想。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老子的观点也颇为相近：“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与？故能成其私。”

3. 有关本书的出版

《自然不可改良》一书，无论对于环保工作者，还是对一般读者来说，都是一本使人受益良多的佳作。该书首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作者的思想转变——由一个肥料经纪人，到一位反对在农业领域使用化肥和杀虫药的环保专家的转变历程。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在书中剖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世界环境的破坏，

并指出了现存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当变革之处。卢岑贝格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的思想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开始阅读这本书时,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甚至会觉得读起来有点淡然无味。但是,如果读者诸君能够有耐心看完它,相信一定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事实上,最初接触到本书时,我个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认为何塞·卢岑贝格也不过是像某些诺贝尔奖得主一样。但在我静心读完此书后,才觉得他比其他的诺贝尔奖得主又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他所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科学,而是深入到人类科学的前沿地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一年前,我向西格弗里德·帕特出版社提出有关在中国翻译出版该书的建议。西格弗里德·帕特表示该书如果能够在中国出版,对中国的环保工作将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表示愿意放弃第一版的版税,以促成该书在中国的顺利出版。在得到西格弗里德·帕特的首肯后,我和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女士进一步探讨了有关出版事宜,得到了董女士的热情支持。她表示将把该书列入三联的环保系列丛书。在此,我感谢董秀玉女士和西格弗里德·帕特先生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的中译本将无法与读者见面。

中译本的初稿由旅居德国的环保专家苏毓辉博士校读,她同时对译文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在这里我衷心感谢苏毓辉博士的协助,同时感谢吴蓉女士对译文的校正。

1998年9月12日 波恩



何塞·卢岑贝格

自然不可改良



何塞·卢岑贝格(中)和西格弗里德·帕特(右)



卢岑贝格在该亚生态
农场的养猪场